

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

【下】

宁志超 李 佶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

【下】

宁志超 李 佶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下 篇

六 谁是青白釉元青花瓷的 拥有者

我们曾有文章专门探讨十三四世纪的波斯和欧洲购买青花瓷的能力，同时，也叙述了波斯商人于明代批发瓷器的情况和瓷器的价格。明代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精通书画、赫赫有名的董其昌在其《骨董十三说》中，也谈及当时瓷器的价值：“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使一磁盘、一铜瓶，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所知也。”这是指大元灭亡一个半世纪以后的董其昌时代的瓷价。那么，元瓷当时更为稀罕、更加昂贵，什么样的人才能拥有呢？尤其元青花瓷方兴未艾，不知它当时有价无价？让我们从大元社会现实环境中，探寻元青花瓷的拥有者。本文是在排除伊斯兰因素和出口外销思路干扰，已经证实它是大元时代的精神产物：大元多元中华文化的结晶之后，进一步论述它不是为普通蒙古人和中原汉民族，而单纯是为极其少数的统治者们所烧造的独有的圣物。据《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著，内蒙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蒙古族简史》第四节“元代蒙古族的社会组织和阶级状况”一文介绍说，蒙古国建立前后，封建生产关系在这个时期的蒙古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

1 蒙元时期的社会历史

从成吉思汗铁木真时起，蒙古大汗即将本族劳动人民、非本族的各部落成员以及在战争中俘获的各族人口一律以分子（蒙语称“忽必”）的形式分给各级那颜领有。在13世纪的蒙古社会中已经找不到不属于任何领主的牧民和牧地，蒙古各部落的成员都已成为各级那颜的私属依附民，成吉思汗的札撒（法律）一再肯定了这种关系。元朝的法令也一再声称，牧民不得“擅离所部，违者斩”。藏匿流徙到别部的人要处以杖刑，因某种原因离开所部的人必须送回原部“著籍应役”。在这样严格的社会组织结构下，蒙古社会分为享有各种封建特权的统治阶级和承担各种封建义务的被统治阶级（图6·1至图6·5）。

随着领户分封制的确立、牧主经济的出现、等级制及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形成以及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与周围早已建立封建制的各族的接近和相互影响，元朝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广泛采用汉法，使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急剧变化，并逐步过渡到较完备的封建制。以大汗为首的各级那颜，包括诸王、后妃、公主、驸马以及万户、千户首领等，是蒙古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大汗是这个阶级的最高代表，成吉思汗铁木真家庭成员是这个阶级的最高层。自大汗到各级那颜，形成一个等级制的、阶梯式的世袭统治。由各级那颜领有的劳动牧民和家庭奴隶，是蒙古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基本生产者。由于每个牧民都被固定在各个领地内，并同领主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必须向领主承担“各出差发”的义务。“差发”包括缴纳实物税、呈献贡物、应差役、服兵役、提供驿站所需的一切，等等。牧民所承担的实物税主要是缴

纳各种牲畜。窝阔台曾制定牧民应缴实物税的定额，一般马、牛、羊群每一百头应分别纳牝马、牝牛、羚羊一头，牝马、牝牛、羚羊十头以上纳一头。这是最早法定的赋税，蒙语称为“忽卜赤邻”，汉语叫“科敛”。抽分以外，牧民还要向领主提供食用的羊和饮用的马乳，这种贡物蒙语叫“首思”。窝阔台时规定蒙古牧民每一群羊应缴一只二岁羯羊作为供大汗食用汤羊（蒙语称“署涟”），所有的千户应轮流向他贡献牝马和牧马人，每年轮换一次。在这年内，牧人负责挤马乳和将它制成马奶酒，供大汗和诸王、勋贵聚会时饮用。同时，小贵族也有向大贵族进献羊汤和牝马的义务，实际上这些都转嫁在劳动牧民的身上。

蒙古那颜因某种需要，也可随时征调属下民户出牛、马、车仗、人夫等供差役，替他们服无偿的劳役。在那颜举行围猎期间，牧民常被抽去服役，包括围赶野兽、掘坑挖壕、布置临时围墙。围猎期长达三、四个月，劳役不轻，而布围所用的绳、毡等物都要用牧民自己的马鬃和畜毛制成上纳。兵役是蒙古牧民另一种沉重负担，在发生战争时，《元史》卷九十八，第2508页载：“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彗为兵”，战士的装备一律自备，也没有固定军饷。蒙古牧民还要提供对驿站的一切负担，其中包括维持驿站所应负的一切劳役、供应过往使臣的饮食、提供交通运输所需要的站马、辅马和车牛等等。部分蒙古牧民在沉重的负担下逐渐贫困化，沦为叫“牙当吉”的穷人。元初一次检核出诸王兀鲁带所部贫无孳畜者达三万余人。1329年（天历二年），赵王马札罕部有民五万五

千余口“不能自存”。蒙古贫苦牧民经不起残酷剥削，往往以子女鬻人为奴。蒙古军户往往因调戍远方，“跋涉万里，装囊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鬻田产，甚至卖妻子”（见《元史》卷一三四，第3258页）。站户因受役过重，也“有贫乏而鬻其妻、子以应役者”（见黄晋《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廿四）。特别是西北诸王发动叛乱，致使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流向和林、漠南就食，在途中因“饥乏不能达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侄易米以活”（见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五碑》，载《元文类》卷廿五，第4页）。蒙古统治者一面执行民族压迫政策，把蒙古族列为第一等，另一方面又使蒙古贫民日益贫困化，致使“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者”（见《元史》卷廿七，第614页），比比皆是，在泉州等海港，甚至还有商人将蒙古男女贩往西亚和印度等地做奴隶的现象。这些事实深刻地说明了蒙古劳动人民备受压迫的实质。家庭奴隶居于蒙古社会的最低层（图6·1至图6·5）。成吉思汗铁木真以来，蒙古贵族掳掠了各民族大量的俘虏，把他们分配在贵族的家庭和各千户所属的牧户中，承担家务劳动或放牧牲畜。据出使蒙古的宋朝使者记载，窝阔台时蒙古的牧马人（兀刺赤）多是各族俘虏，其中“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除外族俘虏外，上述蒙古牧民常因贫困而出卖妻、子为奴隶。家庭奴隶完全从属于自己的主人，没有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劳动极其沉重。家庭奴隶的主人为了便于役使，宁愿使用从外地掠来的儿童作奴仆。这些儿童在恶劣的劳动、生产和气候条件下，死亡和残废率很高。据一个少年奴仆自述，他的主人只发给他一件皮衣，每天给少量干粮，要牧羊二千只，如果发现牲畜有瘦弱、受伤、丢失和无故死亡的情况，就要受到鞭打。在一定条件下，家庭奴隶可被允许建立家庭和占有财产，以便通过缴纳租赋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剥削。因此，家庭奴隶往往在本身或下一代就转化为依附牧民身份。

蒙古统治者以武力统一全国后，人为地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人为蒙古人，包括大漠南北诸部；第二等人为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包括唐兀、畏兀儿、回回、钦察等；第三等人为汉人，大体指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包括汉人、契丹、女真、高丽等；第四等人为南人，基本是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方面对四等人给予不同的待遇，汉人和南人则在猜防与歧视之列。在政治上，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采取防范措施，就是使用也持保留态度。凡军政大权皆由蒙古人执掌，“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见《元史》卷八十五，第2120页）。不仅丞相必用蒙古勋戚，各道廉防司择蒙古人为使，有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充任，其次参以汉人，就是各路达鲁花赤也完全由蒙古人充任，汉人、南人已充任者则罢免之。在军事上，汉人不得参与军机重务，民间不得掌有武器。同在中枢，内外兵员多寡，“汉人不阅其数”（见《元史》卷九十八，2509页）。元廷曾明令“禁汉人执弓矢、兵杖”，“申严江南兵器之禁”（见《元史》卷廿三，第520页；卷十

七，第371页）。就是在籍汉军平时也不得执兵器，“出征则给之，还，复归于官”（见《元史》卷廿九，第658页）。在经济上，各等人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也截然不同。一些回回商人可以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享有种种便利。就是税收，待遇也不一样。“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数乃取”（见《元史》卷十九，第404页）。每逢官府拘括马匹，“隶蒙古军籍者免之”，“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见《元史》卷二十，第426页；卷十四，第290页）。在文化上，对各等人的待遇也有差别。录取国子学生员以蒙古人、色目人为先，其中“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见《元史》卷八十一，第2029页）。按人口比例，后者录取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而且试贡方法也宽严不一，“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见《元史》卷八十一）。在科举方面，除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发榜外，考试的内容和应试的场数也各不相同，乡试和会试蒙古人、色目人考二场，汉人、南人考三场。甚而限制汉人、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在法律上，也有许多不平等的律条。元律，盗劫初犯、再犯刺两臂，三犯刺项，而蒙古人、色目人犯盗者免刺。汉人殴死蒙古人处死，而蒙古人殴死汉人只断罚出征。蒙古统治者把全国人分为四等，表面上是突出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地位，让他们享受特权，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享受特权的只限于少数统治者。蒙古人、色目人中的广大人民也和汉人、南人一样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号称第一等人的蒙古人中的广大牧民，负担沉重的劳役、站役、兵役和税赋，“贫无孳畜”，“不能自存”，甚至鬻妻卖子。1322年（至治二年）仅宗仁卫收容的被卖为奴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就有三千户，1323年已达万户。而汉人、南人中的地主阶级不仅有高官厚禄，一些有权势者甚至“典卖蒙古子女为驱（奴）”（图6·1至图6·5）”（见《元典章》卷五十七，第15页）。因此，蒙古族所建的元朝，实质上是以蒙古贵族为主，各族统治者联合对劳动人民施行统治的政权。历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都在证明，只有蒙古的统治者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黄金家族”才是元青花瓷的唯一拥有者：

（1）萨满教的解释，只有他们是白骨者，是长生天之骄子，是蓝色的蒙古人，只有他们需要这种象征和精神支柱。这是元青花瓷产生的精神要素。

（2）只有他们是当时欧亚、乃至非洲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只有他们的财富能与灿烂辉煌、精美绝伦的元青花瓷相匹比。由此可见，黄金家族之外的广大蒙古人民虽然被大元政府列为第一等人，但他们不是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所以，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拥有元青花瓷。况且，仅限于在当时统治阶层中传播的藏传佛教，13世纪忽必烈利用其控制西藏，后来自己也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了，当时还没有在蒙古草原广大蒙古人民中传播开来，部分上层统治者和广大

草原人民始终信仰萨满教。

改革后的藏传佛教真正在蒙古草原的广大人民中传播开来，那是16世纪后半期明代蒙古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俺答汗的势力占据青海，进入藏族地区，黄教由西藏经青海传入蒙古。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俺答汗出征撒里畏兀儿（黄头四鹞），在途中遇上了许多藏族商人和一千多名喇嘛。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俺答汗的重孙切尽黄台吉（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进兵藏族地区，向那里的头领和大喇嘛提出：“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我即加兵于尔。”结果，“收复三部落图伯特”（见魏源《圣武记》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500页、《蒙古源流笺证》（图6·6）卷六，23至24页）。切尽黄台吉本人出于军事上的需要首先皈依了喇嘛教。1571年（隆庆五年）俺答汗接触到喇嘛教后，打算仿照忽必烈和八思巴建立经教之朝的故事，邀请高僧前来蒙古传教。是年恰遇索南嘉措（即第三世达赖喇嘛）派来的高僧阿兴，向俺答汗讲佛传经，劝导他发展佛教，皈依三宝，“因而俺答汗、钟金哈屯（三娘子）以下，举国部属始皈佛教”（见《俺答汗传》辛末年段）。1578年（万历六年）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召开法会，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蒙古受戒者多达千人，仅土默特就有一百零八人出家为僧。法会上，索南嘉措被俺答汗等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由此产生的。索南嘉措也给俺答汗上了“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

万历九年十二月俺答汗卒，他的后裔邀请蒙古各部汗王以及第三世达赖喇嘛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应邀前往，沿途对蒙古各部宣传黄教，得到各部汗王的崇奉，有的还出了家。索南嘉措为了进一步争取蒙古封建主的支持，巩固其在蒙古的影响，还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行动，即在他临终之前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的曾孙就成了第四世达赖喇嘛，并立刻得到西藏格鲁派的承认，命名为云丹嘉措。宗教权威与蒙古正统的汗权相结合，更有利于喇嘛教的推行。《黄金史纲》（图6·7）称：“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俺达可汗的黄金世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13、14世纪藏传佛教仅流传于大元统治阶层，后随大元灭亡而衰败。改革后的藏传佛教（黄教）却在元王朝灭亡两百多年之后风靡整个蒙古。前者虽然信徒人数不多，但因为它是当时大元意识形态的主体，为大元多元中华文化深深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藏传佛教成为大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者尽管风靡了整个蒙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笼罩着整个蒙古族人民的心。但是，没有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和留下有如13、14世纪红教那样深刻影响的痕迹。由此可以充分证明只有大元的贵族、大元的统治者、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生有白骨头蓝色的蒙古人才是元青花瓷的唯一拥有者。元青花瓷绘画装饰艺术中的佛教纹饰，表现着佛学的奥义和它的哲理，本身就是

信仰喇嘛教元朝蒙古统治者的象征和归宿的确凿证据。

我们说13、14世纪元青花瓷是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标识，那是因为自1206年蒙古草原各部在鄂嫩河畔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之时起，从神学和历史学角度，蓝色和白色就已经成为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灵魂的代表之色。

（3）因为青花瓷的白色和蓝色搭配本身与中华民族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文化习俗相悖，汉民族一见到它就立刻会联想到葬礼和阴曹地府，活人不可能拿它作为日用或陈设瓷摆在家中，最多根据佛教的联想发展到用它来当做明器或供器，用来作为人与鬼神之间的沟通工具；1980年江西九江元延祐己未年（1319年）墓出土的塔式牡丹纹盖罐，和现藏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为道教烧造的供器元青花云龙象耳瓶一样，就是两件佛、道典型的例证。

中原的汉民族开始使用青花瓷作为明器和供器或祭器，是民族审美意识和约定俗成的民俗对蓝色和白色两种颜色认识和理解以及对佛教联想的融合，是信仰与崇拜和对鬼神迷信的结果。元青花瓷装饰纹样几乎全部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或全部绘以佛教纹饰。有些虽然满绘历史人物故事或有文人寓意的作品，也必然绘以佛教辅助纹饰。只有非常罕见的极少数单纯表现大元帝王本人画篇的器物，没有佛教纹饰，但它都是纯粹萨满教义与精神的产物如：蓝地白龙或白地蓝龙纹，就是只有主饰纹没有辅助纹饰的器物。元青花瓷绘画装饰的内容和寓意与伊斯兰教义相悖，已经明确说明与伊斯兰教并无瓜葛的事实。况且，伊斯兰教有自己尊崇的颜色，816年前后绿色为伊斯兰尊崇之色，为广大穆斯林所推崇。

2 谁是元青花瓷的拥有者

《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说：成吉思汗铁木真订立法度“没有费力去遵循传统”。千户制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成吉思汗铁木真为了建立这项重要的统治体制，毫不犹豫地把虽然瓦解、人们却很习惯和留恋的民族部落结构，断然改变为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融为一体的组织。作为军事单位，千户内从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必须一律服兵役，随时遵奉国家的命令，自备马匹、兵仗，由千户、百户长带领出征。无论贵贱，谁都不能免去这项义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千户所属的居民，都要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姓名记入户口青册，不准变动。“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把民户固定在百户、千户以内，就是要他们一个也不漏地负担差发，使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变为“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人众。

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黄金家族”，是蒙古国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吉思汗铁木真把组编成千户的蒙古人众，连同管辖千户的各级那颜（官人）当做他和他的“黄金家族”的家产分配给自己的母亲、诸子、诸弟。据《元朝秘史》所载，按照分配家产的惯例，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诸子、诸弟又可以把分配给他们的人众和各级那颜再分配给各自的亲族。那颜们对大汗和大汗的宗亲处于绝对从属地位。他们是被委任管理百姓的地方军政官员，可以因故随时被撤销职务。因此“黄金家族”凌驾于全体蒙古人民之上，所有蒙古人民包括异姓领主都成为这个家族的属民和附庸，其所居的土地则成为他们的封地。大汗的权力高于一切，是这一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和体现者。这样，全体蒙古人民、各级那颜贵族和以汗为首的“黄金家族”便构成了一种等级制的隶属关系。

封地内的普通牧民处于这种等级的最底层，不论其原先的社会身份如何，是自由民，还是属民或奴仆，在千户制建立后，他们都被强制地纳入固定的封地之内，随汗委派的那颜贵族的统辖，身受层层剥削和奴役。居于统治地位的万户、千户那颜则受大汗的封赏，成为封地的主宰，并且获得世袭的权利。他们在本营范围内拥有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统领军队等等权力。作为大汗亲信重臣的那颜可以出席选举大汗的会议，参与国政。建立有特殊功勋的那颜，还享有种种特权。被大汗赐予“答剌罕”称号的人，可免交一切赋税，独有其战利品的全部，随时可入见其主。这种人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九次犯罪可以不罚。

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千户制，实行领户分封，基本上杜绝了氏族贵族复辟的可能性，保证不会轻易出现任何势力与他的“黄金家族”相抗衡。另一方面，这种措施也对蒙古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克服了以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自由结合的分散性，全蒙古各部都被纳入黄金家族和贵族的领户中，每个蒙古人都成为统一的蒙古国的臣民。其次，过去以部落氏族为细胞的社会组织，现在被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大汗的军事行政系统代替，形成了层层隶属的等级阶梯。贵族们从汗那里分得领户，确立了对属民的领属关系，从而获得了领主身份。固定在土地上的蒙古牧民也因之变成了依附人口（见《蒙古族简史》第38、39、40页，内蒙人民出版社；《元史》卷九十九，第2524页、第2525页、第2508页；《世界征服者史》何离济译本，上册，第27至34页，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由此可见，当时的蒙古从法律到习俗乃至依附人口的性命均属“黄金家族”所拥有。从这个角度理解白蓝这两个“黄金家族”独有的颜色，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青花瓷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的象征，是“黄金家族”的标识。

白色和蓝色是蒙古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精神支柱，蒙古是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龙翔之地。蒙古族文化是青花瓷产生的摇篮，蒙古贵族统治政权的大

元多元文化是元青花瓷产生和成长的沃土。元青花瓷是蒙元时期多元中华文化的结晶，是大元整体意识形态具体表现的产物，它是统治者的灵魂与圣物。如此说来，只有蒙元时期的蒙古贵族，他们是“查干·牙速惕”即白骨者，是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元青花瓷是天意，是与贵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蒙古贵族是元青花瓷的唯一拥有者。

3 悬棺与元青花瓷

2002年9月24日，大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悬棺”清理维修工程正式开始。此次维修工程由宜宾市文物专家组成维修组，对珙县麻塘坝的三仙洞、猫儿坑、邓家岩等七处四十二具悬棺进行“整容”，并首次对距今数百年的悬棺进行开棺清理。在现场发掘中，出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奇迹：发现一件镶金边的色彩艳丽、多达七层的丝麻织品；发现元代青花瓷器和一件牛角梭镖实属首次。在悬棺棺顶和棺体，还发现有火烤过的黑色痕迹。这种葬俗是人死之后并不入土埋葬，而是将殓尸棺木置于下临溪河、上摩云天、绝地千仞、峭如斧劈的悬崖之上。这些现象均构成僚人习俗与伊斯兰教毫无瓜葛的证据，与中东的伊斯兰更是没有丝毫的关联。

僚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民族一样，无论多少，都曾以青花瓷殉葬，结合各种有关资料综合分析，可以说明僚人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1978年浙江杭州市出土的元青花瓷观音像和江西博物馆藏元青花釉里红堆塑亭楼式谷仓，以及1980年江西九江延祐六年墓出土元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罐等，说明整体多元中华文化自身的表现。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它包含有伊斯兰文化。现存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藏元青花云龙象耳瓶是供奉给道观的。每一件元青花瓷上几乎都画有佛教和藏传佛教纹饰，证明元青花瓷与佛教的渊源关系，这非但在西藏的佛教中能够得到证实，在佛教传至西藏的印度佛教发源地亦能得到有力的证据。世界第三大元青花瓷收藏地在印度，建于1354年位于德里的（Tughlag 图克鲁克宫殿），它在1388年后很少居住，毁于1398年，该宫也藏有数十件大多残缺不全的元青花瓷大器。

中国元代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游牧主，代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地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政权。其文化特征的总体，是融合蒙古族等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大元多元中华文化的总体，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它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性。藏传佛教思想是大元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体，元青花瓷是含有浓厚藏传佛教教理教义和萨满教精神的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的灵魂与标识。忽必烈的异母兄弟旭烈兀在当时的波斯建立了大元的从属伊利汗国，和大汗哥哥一样也是多神偶像崇拜者，现存中东的大批元青花瓷是

忽必烈运给旭烈兀家族的黄金家族的象征，与当时当地的伊斯兰信仰毫无关系。

这次悬棺中元青花瓷的发现，证明大元社会已不止蒙古族人崇好元青花瓷，其他民族也正在尝试使用元青花瓷。除蒙古族人以此当做圣物之外，其他不同民族也和汉民族一样，已开始拿青花瓷作为殉葬明器、祭器和供器使用，已为萨满教、藏传佛教、佛教和道教多种宗教所接受。它是一种大元文化现象，是整体大元多元中华传统文化的继续与发展，它是不断提高的鲜明时代性的具体体现。由此分析，该器应为元青花瓷民窑产品。这与元乃至清代朝服表现的层次多、装饰满，甚至与佛教和藏传佛教信仰，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见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装饰艺术的传承关系。

我们从发现的这件多达七层的镶有金边的色彩艳丽的丝麻织品分析，使我联想到大元统治者所青睐的纳什什（在当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拥有的）。元青花瓷与蒙古统治者切切相关，这些事实似乎说明着死者的身份。根据大元政权是蒙、汉及其他游牧主、地主政权，悬棺又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能享受的这一点分析，死者可能是当地的统治者，他与当时大元政权的主宰者蒙古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被火烤过留有黑色痕迹的棺木，与信仰中以火净化是否有某种关联呢？我这种考虑，是因为被火烤过的并不是所有的悬棺，使我联想到当时地方权势者与统治者蒙古人的关系，甚至想象其密切的程度。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同化，人口比例较少的弱小的民族，接受强权的势力和大民族的文化习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土僚人死后，用小匣子盛装部分尸首，“携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俾人、兽不能侵犯”，使死者受到保护，表达了对死者的尊敬。另据元代《云南志略》记载，土僚人死后，置于千仞岭岩之上，先坠者为吉。也就是说，悬棺放置得越高越好；自然坠落时，落得越快越好，以求子孙后代幸福安康。马可·波罗是一个文盲，旅居中国期间与元朝蒙古贵族关系密切非同一般，曾长期在元朝为官。《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是他返回故土之后，在狱中口述，由狱友帮助写成的。说明上述僚人这一奇特的丧葬风俗似曾亲历，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他和当时大元统治者蒙古人的关系非同小可，又对僚人丧葬礼俗了如指掌（别说是当时的意大利人，就是今天的中国人自己对僚人的历史，尤其丧葬礼俗的了解亦是十分陌生的），加上悬棺棺顶和棺体都留有火烤过的黑色痕迹本身，与蒙古人信仰中以火净化相符合，加上棺内出现的元青花瓷和纳什什等等不同寻常的迹象，综合观察分析，似乎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初蒙古人进军四川、云南、灭大理国期间的前前后后，与僚人曾建立友谊，或许构成蒙元时期‘蒙僚关系’史上的证据”。另外，位于云南省西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据说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至今仍然人人爱马、会骑马。联想元代蒙古人在云南囤军和今日在云南生存的蒙古族人，以及

云南玉溪窑元青花瓷的出现，它们似乎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元末明初朱元璋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对元代史实残酷破坏和销毁，在元史和民族史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所留下的至今未解之谜，有待我们像破译元青花之谜那样去破译。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蒙元时期出自大漠草原的这些半原始的蒙古人，为整个世界留下太多的谜，上述中国少数民族的元代历史被人为地埋没，令世人一无所知。那么，中东的伊朗和土耳其乃至欧洲的匈牙利，他们虽然粗略地理解自己与蒙古人的关系，但更详细的资料却仍然需要今天的学者来补充。

4 汉文人与元青花瓷

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制造代表自己灵魂和象征的青花瓷，它的意义并不亚于攻城掠地。他将北方磁州窑系熟练烧造青花瓷的全班人马一起调去景德镇，当时诸多的官府手工业局就是这样组成的，相信是无可非议的。对窑工们来说，只因为忽必烈这位大元皇帝有这个要求，已无可反抗，单单要求活命，也会使忽必烈如愿以偿。况且，我们在文献中已多处见到记载北方窑工自愿南迁的事实。无论我们今天怎样理解这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这都是破天荒第一次两种最佳优势的最佳结合，为中国青白釉元青花瓷的创烧起到了巨大开拓的决定性作用，开创了陶瓷史上青花瓷烧造的新纪元。

在忽必烈特权的直接干涉之下，促成这两种最佳优势的结合，实际上是真正成熟意义上青白釉青花瓷的催生剂。从此结束了中国青花瓷长达数百年漫长的萌芽期，预示着中国和世界陶瓷史黄金时代的来临。随着景德镇浮梁瓷局——即元代官窑的建立，精美无比光辉灿烂的青白釉元青花瓷，从一开始就光芒四射、五彩缤纷、大放异彩，令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举世震惊。无疑，它是全人类的伟大创举。然而，青白釉元青花瓷的生产，它的创烧，单有工匠和优质高岭土以及统治者所具有的思想和精神，哪怕还有大量的财力，假若没有意境深远的神学家和汉文人精心围绕信仰和大元整体意识形态设计画稿，和技艺高超的画师的紧密配合也同样是烧不出来的。一件完美的青花瓷艺术品，缺少不了画篇中那高雅深远的意境，这需要造诣很深的神学家和汉文人来完成。

人世间，文化艺术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强权虽然有时可以战胜一个民族，但却战胜不了它那高度发达的文化。汉文人在宋代时，在士农工商的各色人等中排在第一位，有官可做，有事可干。可到了元代，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之下，元朝政府除了将臣民划分成四等人外，还将南人另外划了十个等级，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儒士们只比乞丐强一点，连妓女都不如，若同和尚喇嘛相比就更不行了，他们没有机会去做官，

因为科举考试被取消了很长时间，走投无路，流落街头，和唱戏的伶人们混在一起，编戏、演戏，揭露社会黑暗，诉说穷人痛苦和被外族统治的不幸。当时，那元曲唱得也实在激动人心，使人们不由地要仇恨起这个社会来。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都在这个时期四处活动，他们的《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都是当时人人喜爱的。

元青花瓷的出现，它和戏剧艺术一样为汉文人开创了另外一块生存的空间，为绘画艺术家同时也提供了反抗外族侵略和统治的条件与机遇，元青花瓷上没有以纯山水画为主饰内容的画篇和不画迎客松也不画土，和古人有怒画竹的说法，使元青花瓷画面产生有松、竹、梅，还有带刺的葫芦叶等画篇，为后人永远留下了反抗的记忆。他们除在青花瓷上真实地记录了蒙古统治阶层的时代思维与动向（以皈依喇嘛教为典型的整体意识形态）之外，还将民间艺术和广大人民的真实生活如实地反映到元青花瓷绘中来。那些寓意深远的传统纹样掺杂其中，也是蒙古统治者所拥有的元青花瓷装饰中汉文化艺术内容之一。元青花瓷中多绘松竹梅，表现汉文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清脱潇洒的品格和凌霄直上的气节。这就是从相反方面证明了元青花瓷只能是为入侵者——即蒙古统治者烧造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元朝统治阶层由于利用佛教统治吐番开始，到自己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这就必然造成元青花瓷除了具有萨满教精神主导之外，还掺合了藏传佛教的宗旨与教义，形成了元青花瓷独有的特征，通过汉文人绘画艺术的升华和表现形式，体现在每一件元青花瓷上，它构成大元多元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这就是元瓷瑰宝，这就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证明了元青花瓷是为蒙古统治者烧造的。

中国青花瓷始烧于唐代，由于与汉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相悖，经过四百年的艰苦历程，仍然无法得到发展。到了元代，蒙古族人的习俗恰恰与汉民族习俗相反，汉民族不能接受的恰恰是蒙古族人所极力推崇的，比如大年初一，蒙古人自皇帝到臣子举行宴会都穿白衣服，从帽子到靴子，一身洁白，与汉民族千百年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截然相反，这对中原的汉民族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汉民族的年节和嫁娶，喜欢大红大绿、大吉大利。而前一种场面无疑仅能是汉人丧葬和出殡的礼仪。就是从千百年约定俗称的民族习俗和审美取向方面证明了元青花瓷只能是为蒙古统治者烧造的。但大元政权是蒙古人的，他们根本不管别人有什么反应，既然青花瓷是他们的灵魂与标识，是圣物，他们就必须得到。他们以政权干涉、金钱支持，以及对汉文人和绘画艺术家的歧视与利用，元青花瓷产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元青花瓷是在大元统治者一手操纵下产生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大元的统治阶级是元青花瓷的唯一拥有者。换句话说，在当时只有蒙古统治者追求和需要也只有他们有能力承受青花瓷。在元代，青花瓷并没有被广大汉民族所接受，也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而恰恰正处在他们的抵制之中，千百年封建迷信的汉民族文化习俗，紧紧

地束缚着每一个人，不允许他们越过雷池半步。这种论述是正确的，但仅仅是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青花瓷确实还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根本谈不到千家万户，瓷价的高昂，贫富的悬殊，当时就算没有那么多习俗和清规戒律，除那些贵族之外，似乎对整个广大只为生存奔波的人民来讲，青花瓷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如滕州邹县人李仲谦，当时任浙西按察司书吏，由于奉禄太少，奉养不给，夫人还要纺纱织布，卖了钱贴补日常家用。仲谦仅有一件布衫，洗涤或缝补都要用休假日来完成。如果有宾客来访，就告之“家君治衣，未可出”。又如读书人吕思诚，家境贫寒，一天早上，家中断粮，欲携布袍出去换米。夫人颇舍不得这件布袍，思诚因戏作一诗曰：“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几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江南一位“博学能诗文”的隐士，连布袍也没有，平时只是“露顶短褐，布袜草履”。文人孔齐的父亲曾为建康书吏，家境较好，服装用具也很简单，“服装尚绸绢、木棉、若毳衣、苧丝、綾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绸袄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布衣素履、磁器木筋、与常人同”（《至正直记》卷三《衣服尚俭》）。自古中国人爱瓷莫过于文人墨客，但元代的青花瓷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习俗的束缚，只因囊中羞涩也就是望尘莫及的了。上述正反两方面的论据都在有力地证明着中国元青花瓷的唯一的拥有者，只能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历代的执政者——即天子。到了元代，就只能是大元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即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成员，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

5 1295年前伊利汗国的意识形态

今天的中国、蒙古和伊朗是三个独立自主的国家。1206年，草原骤变，成吉思汗登上大汗宝座，世界格局和今天一样，它们也是三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分别称之为大宋、大蒙古国和波斯。只是大蒙古国和大宋朝之间还有一个金国。后来，成吉思汗铁木真西征和入主中原，通过三代蒙古人的征服战争，当时的金国、大宋和伊朗，相继落入蒙古统治势力的控制之下。

忽必烈和旭烈兀是异母兄弟，系托雷之子，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他们都是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的蓝色蒙古人。忽必烈为着征服的目的地政权南移，改元大元，建都大都。从此大都成为大元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此时的旭烈兀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统治波斯，从属大元，始终不渝地拥护其兄大汗忽必烈和维护大元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以波斯为根据地，以无限扩张为准则。自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大蒙古国奉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历代统治者从信仰萨满教，到忽必烈从八思巴受喜金刚灌顶，皈依佛门，成为护法金刚。他

与之后的列位大汗和波斯伊利汗他的兄弟及其子孙们，仍然保持了以火为净化的典型多神崇拜（藏传佛教包含有苯教内容——即西藏萨满教成分）。旭烈兀和他的子孙们一直到1295年，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与波斯当地以水为净化的典型伊斯兰一神崇拜和信仰仍然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水火不容无可调和的。

这时的大元中原和波斯的命运是一样的，受到同一个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统治，生存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约束之下。当时的波斯和当时的云南大理国以及西藏一样，被划进了大元势力范围之内，包括在大元当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疆土之中。所不同的是，雪域西藏和大理国从此永远划进中国的版图。而波斯则随着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通过完泽笃和不赛因的相继统治，以及不赛因之死导致的波斯蒙古汗国的肢解，走向脱离大元的道路，直至波斯蒙古汗国彻底瓦解，并真正溶于伊斯兰世界，使波斯的每一个蒙古人都彻底地变成了真正的穆斯林。

合赞汗为着更好地统治波斯和更大的扩张，于1295年，改信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这一系列行动均曾得到当时大都元成宗铁穆耳（即完泽笃）承认的。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也和大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从利用藏传佛教开始，到自己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合赞汗为着统治，从利用宗教到自己也真正地变成了伊斯兰虔诚的穆斯林。对潜移默化和信仰的改变，直接导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骤变所能造成的后果，是这两个最高蒙古兄弟统治集团决策者无从预料的。有史为证，他们并未想分道扬镳，却走上了分裂的道路。这两个千真万确的血缘兄弟统治集团，为着集团的利益和统治的需要，本着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升天之路。由于信仰虔诚的程度不断加深，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从亲密无间的血缘兄弟到产生不可逾越、无可调和的巨大鸿沟，直至彼此成为面目全非的陌生人。对这种宗教巨大而潜在的渗透力和无坚不摧的破坏性是这些蒙古统治者，这些黄金家族的蓝色蒙古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对于宗教导致和加速了他们的瓦解、崩溃，直至灭亡的命运，更是梦中也未曾预料到的。没用几百年的时间，这股来自蒙古草原的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力量，就被宗教变成了一只无助的羔羊。

然而，有史为证，他们宗教信仰的改变是突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却是逐渐的，或者说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等一系列行动是得到元成宗铁穆耳认可的，起码说明这样做符合整体大元利益，成宗铁穆耳才点头同意的。说明自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铁木真施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忽必烈成为佛国的护法金刚信仰藏传佛教，到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这些蒙古统治者没有一人认识到宗教这剂麻醉剂的厉害。仅仅一厢情愿地设想利用宗教，甚至幻想如同利用被征服地区的地方势力和地方武装一样，控制他们为自己服务。结果却无一例外地掉进自己设计和利用的宗教旋涡越陷越深，无一自拔，最后几乎导致整个民族的灭亡。被自

身所利用的宗教俘虏，被征服地原居民同化，被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和整体社会文明所吞食。

历史留给我们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合赞汗当初带领整个波斯汗国的全体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在蒙古统治阶层的意识中并不表示信仰的对立和政治的决裂，甚至是他们幻想继续统治和扩张中采取的步骤，或者是为继续侵略而实施的策略，但绝没有想到那是自己设计导致自身囹圄和最终灭亡的陷阱。

1298年，合赞汗遣使入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即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给合赞。现存1302年合赞致法国国王信上，钤用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当是元朝新颁给伊利汗的王印。1305年，合儿班答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上钤用汉文“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方印。1316年合儿班答卒，子不赛因嗣位，还都桃里寺。权臣出班有拥立之功，不赛因为他向大元请封，1324年泰定帝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赐银印，金符。

上述等等事实有力地支持着本文整体论述，标志着伊利汗国虽然自合赞汗起，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仍愿意和保持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的荣誉和信念，尽量求得与大都步调协和统一，直至灭亡。

那么，皈依伊斯兰后的伊利汗蒙古汗国，从表征而言，为了统治，也为了尊严，已失去继续接受藏传佛教多神信仰遗物——元青花瓷的可能。在这种整体大元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元青花瓷必然是大元整体意识形态主体的载体。由知，元青花瓷的发端和形成乃至成功烧造本身，就是大元整体意识形态表征创烧的历程，完全是大元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蓝色蒙古人内部之事，这已是无可辩驳的历史真实和永恒不变的真理。本文各节与整体论述中所贯穿着的真实历史事实和例证，构成元青花瓷是多神教佛教的、是蒙古人的、而不是一神教伊斯兰穆斯林的无可置疑的铁的证据。

60年来，研究元青花瓷仅根据器物肤浅的表面，挑剔它并非主体的细微末节，从未涉及元青花瓷本质的精神和艺术真谛。这就是60余年研究元青花瓷最本质的原则错误根源所在。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瓷器是历史微观细部研究中情节的证物，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将研究工作置身于宏观历史研究的框架之中，必然缺少历史的整体观念，对它的研究只能是表面的评说，而无理论可言，只能是从迷途走向迷途。

6 元青花瓷是忽必烈关注的新蒙古形象、是大元王朝的象征与标识

元朝在全国统一前夕（1278年），即在江西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这在中国当时的许多瓷区是唯一的建制。由于瓷局的设立，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

造了极其有力的条件。如果我们将忽必烈当时这种迫不及待建立的浮梁瓷局的举动，理解为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陶瓷生产特别重视，甚至等着它发展出口外销赚几个碎银子，维持朝廷部分开支，相信是过于粗糙而肤浅的。当时的忽必烈还没有那么高的学识与远见卓识。我们可以判断自成吉思汗铁木真时代以来的蒙古人所取得的进步，于斡难河畔的半原始人经过了两代人之后已经上升到具有悠久文明民族的水平上，是否完全可能。尤其是商品经济头脑，似乎我们都没有忘记，到了明朝，中国资本主义才有微弱的萌芽；若说忽必烈时代就注意到制瓷业的发展，目的在于出口外销，是对蒙古统治者们的才智过高和言过其实的赞赏。然而，经济不是掠夺，当时，他们仅具有缺少细腻智慧的巨大力量，这是占领和掠夺的有力条件而不是推动商品经济的智慧，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掠夺所得到的实惠远比发展出口贸易要容易得多，要快得多，收获更大得多。此时的忽必烈无需考虑生产，他的头脑中更不需要出口外销。自大蒙古国的建立，到灭宋大一统，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他们最大的强项——就是杀戮和掠夺。他们杀戮了大半个世界的无辜人民，蛮横地将所有无论什么人的财富统统化为己有，他们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劫掠的巨大财富在他们死后仍供他们的子孙享用了百年，甚至，在蒙古人退出中原之后的后元时期，在没有任何收入仍然维持庞大开支的情况下，还在哈刺和林用数十年时间建造新宫殿，可见后元财力仍然雄厚的程度。然而，通过新宫殿的建造，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些蒙古统治者们的智商，他们对当时时局的发展和朱洪武的胸怀竟一无所知，面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竟毫无反应，对自身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缺少起码的正常判断与分析，似乎建好宫殿就万事大吉，战争与仇恨自会烟消云散。头脑如此简单和麻木不仁，还能有多高的智商呢？

那么，在忽必烈坐镇大都的大元鼎盛时期，如果还需要更多的钱，他们不需要理由和借口，还会发动战争，再去掠夺，而且会得到更多，所以说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能是设官窑瓷场，马上搞出口外销赚几个碎银子么？答案是否定的，甚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当时的忽必烈随着改元大元，意味着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的大蒙古国的消失随之而来的皇室内讧和危机四伏的四十年内战，以及中国南方汉民族的反抗，是他以中国皇帝的面目出现，日理万机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铁木真斡难河畔树立起的九游大白纛是大蒙古国的象征。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改元大元，需要建树自己的新蒙古形象，是大元的象征与标识，或者说是拖雷系的以更近的血亲建立起来的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新概念的靈魂与标识。他迫不及待地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调磁州窑系烧造青花瓷的全班人马组织官府手工业，即官窑，烧造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绝不是和伊利汗国的兄弟旭烈兀（或他的子孙）搞进出口贸易的游戏，而是追求大元的形象、灵魂和圣物。此

时的青白釉元青花瓷已经成为大元的精神产品，它是大元多元中华文明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民族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萨满教、藏传佛教、汉儒教等多元文化艺术形成的一种大元文化的结晶——青白釉元青花瓷诞生了。

我们通过对大元整体意识形态的研究，清楚地了解到忽必烈当时的内心世界和他迫切的程度。为着制造大元新蒙古形象与概念和灵魂的标识、贵族的象征，他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比如，在设置瓷局，成立官府手工业瓷场的整体筹划、地点的选择等一切运筹帷幄精致细密，是十分周到的。当时在中国南北方诸多瓷窑中，比景德镇名气大更具实力的瓷窑，不止一两处，龙泉青瓷就是其中重要例证。蒙古统治者在统一中国前夕（1278年），即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从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和成就以及对这一举措本身进行的分析证明，表面看来似乎时间仓促，迫不及待，但绝非草率。说明他们早有计划、有安排。选择景德镇亦是通过调查研究的结果，没有将瓷局设在龙泉和北方磁州窑系，就是这个道理。统治者了解其中之利弊。景德镇地处群山环绕包围之中的江西东北部，昌江有如生命之水傍镇而过。杂质少、工艺性强、适宜于制造高档瓷器的瓷石、釉果和高岭土大量蕴藏于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和附近的星子、乐平、余江、波阳、婺源的山陵地带。加之，环抱着景德镇的群山之中杂木丛生并盛产松木，为制瓷业提供着丰富的燃料。窑场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利用河水淘洗瓷土并设水碓水力粉碎瓷土；再鄱阳湖水运畅通发达，可上通昌江直达瓷窑，大批瓷器成品可顺流而下至各重要口岸，并通过漕运抵达大都，是何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

我们从波斯细密画研究中，得知成吉思汗铁木真和窝阔台大蒙古国时期，已经在帐殿中陈设有青花瓷，因为当时景德镇还没有烧造青白釉青花瓷，所以，我们根据唐青花和后来发现的北宋青花瓷系北方磁州窑烧造的事实推断，大蒙古帝国帐殿中所陈设的龙纹青花盖罐应该是北方磁州窑系产品。经中国科学院国家实验室使用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同步辐射对本书所发表的几件北宋青花瓷进行测试的结果证明，这些北方磁州窑系生产的北宋青花瓷，仍然和唐青花瓷一样，使用了进口钴料。说明北方磁州窑系生产的青花瓷，唐、宋（包括金、蒙时期）的青花瓷均使用了进口钴料，元代景德镇产青花瓷也大量使用有进口钴料。我们多年来除对唐宋元青花瓷实物进行核物理技术分析之外，还在整体大元意识形态领域里寻找任何可能发生事物的迹象。显而易见，旭烈兀是忽必烈异母兄弟，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争中旭烈兀站到了后者一边，在与西北诸王武装冲突中也始终不渝地维护着忽必烈或者说大汗中央的利益，彼此之间的从属关系明确。这或许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忽必烈和旭烈兀，共同利益清楚，方向与目标一致。这或许就在说明像改元大元和元青花瓷的烧造等一切重大决策，或方针政策中都包含着伊利汗旭烈兀的思想和意

图。那么，在忽必烈为大元制造象征，为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制造新概念，制造自己的灵魂与标识——元青花瓷的时候，旭烈兀和他的子孙必然的也肯定是忽必烈的同谋者和参与者。西亚盛产钴料的卡尚是旭烈兀和他子孙的属地。这时的旭烈兀和他的子孙也必然会一如继往，积极地支持忽必烈尽快烧成代表他们自己灵魂的元青花瓷。这时，有证据说明，当时的伊利汗国亦曾在波斯为追求黄金家族的形象与标识作出努力，作出烧造蓝釉龙、凤纹和蒙古族人物纹陶瓷的尝试，后因技术和原材料的原因无法烧出景德镇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元青花瓷而终止。钴料输入景德镇和青花瓷输入波斯一样，均不构成出口外销，也不属于商业范畴。而仅是忽必烈关注的新蒙古贵族形象和大元王朝的象征与标识，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灵魂与圣物。相信以上论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青白釉元青花瓷是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的新蒙古形象和大元王朝的象征与标识。

7 到底有多少元青花瓷现存于世

过去曾有人统计，全世界各国收藏元青花瓷总合估计有300余件，近20年来世人普遍认为超过此数，已达到或超过400件。但是，上述元青花瓷是指各国各大博物馆藏品而言，不包括私人和民营博物馆藏品。同时也不包括近二十余年来至今尚未引起官方注意的，蒙古国、中国内蒙古地区和大江南北各地出现的大批元青花瓷及其他元瓷，尤其带有规矩帝王年号款识的官窑官款器物更是弥足珍贵，也不包括在内。尽管近十数年来景德镇造假制伪不断升级，虽然文物不能再生，但由于鉴定家缺乏鉴定手段真伪莫辨，每每走眼，已是心惊胆颤。对器物因缺少鉴别能力而失去信心，往往对送上门来的国宝亦会被当做赝品拒之门外（尤其是历史性的挖坟盗墓不法行为，已为人类带来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对这类被盗出土文物也和传世品一样，鉴定家缺乏识别的能力和手段，等同于焚毁历史实证）。造成档次和级别越高的器物，甚至是举世震惊的精绝之作，鉴定家不认，送给国家博物馆因不敢相信也不敢收（这是目前中国文博界存在的最严重、最残酷，又无可回避的现状，无不令人痛心疾首啊）。就是说，目前还有未在统计数字之内的各国私人藏品约上千件或更多，这些器物从不同角度观察，无论是数量和精绝的程度，都远远超过北京和台湾故宫博物院乃至伊朗和土耳其两国的元瓷藏品，甚至是北京故宫从来就不曾拥有也没有见过的珍品，是指为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制造的，即为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制造的专用瓷，即御窑厂制造的御窑瓷。我敢断言，中国故宫古陶瓷鉴定家如果不尽快提高水平引起注意，上世纪30年代因琉璃厂古董商们愚昧无知而造成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被赶出国门和1989年接收假洪武

釉里红玉壶春瓶又出据感谢信的错误，在21世纪的今天，还会不止一次的在世界舞台上重蹈覆辙。据说国际市场上近些年拍卖的元青花大器和元珐琅彩等器就是国内拿出去拍卖的。多年前南方一间大博物馆花过千万元自境外购得的元珐琅彩瓷，就是当年出自内蒙古赤峰市挖坟盗墓的杰作，索价五十万元人民币北京故宫不认，拒绝后拿去香港拍卖的，就是其中一例。现在我们暂时放下民间收藏这上千件或更多的元青花御窑器不说，民窑元青花瓷是异姓贵族为满足内心的平衡而在御窑之后组织民窑烧造的，他们和后来汉民作为祭器，供器和冥器，以及农民军为筹款烧造的元青花瓷都是御窑器同时代的仿制品，造型与纹饰和御窑器相同，只是艺术品与工艺品之分，这类器物数额巨大。单就过去统计过的现存世界各国博物馆的四百余件器物分析，其中只有不足百件是由历史的原因现存伊朗和土耳其的。中国是元青花瓷的发祥地，全中国各地博物馆藏共约100余件，那么，流散在世界各国博物馆的总共还有二三百件，这些藏品多为大器、重器，造型与纹饰如出一辙，不乏举世瞩目的全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绝之作，堪称无价之宝。其中绝大多数均为1949年大陆建国前夕，被无知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如同对待元青花云龙象耳瓶那样，以三瓜两枣地卖出国门的“撂跤货”，那种愚昧、俗不可耐已到了无可理喻的程度，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那对大瓶颈部明明写着至正十一年四月，当时的北京琉璃厂古董商们硬是跳着脚，骂大街，吐沫星子四溅，满口喷粪，叫骂着“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知有多少诸如此类的无价之宝毁于这些无耻之徒的不可能的粪便之中，为中华民族永远留下遗憾，每一位有良知的正直炎黄子孙无不义愤填膺。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再愚昧，已经真正地站起来了，他们已是自己历史文明和文化的主人，今天他们有完整的青花瓷理论，有实证和现代科技，已经不能容忍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继续主宰中国古陶瓷的命运了。古陶瓷研究是一门多学科严谨的学问，因此瓷学在中国当代古陶瓷研究界非但有知识有能力清除粪便，还有充分的证据告诉世人何为可能和不可能，中国人懂得自尊，懂得历史的真实就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同时也懂得了自尊与荣耀是用智慧和勤劳，通过艰辛的努力和奋发图强换来的，它来之不易。

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均可与现存伊朗和土耳其藏元青花瓷相媲美，同样是大元官窑的精绝之作，因为它们均相继出自大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之为1949年前出自大陆的传世品，这是公正而公认的事实。那么，这些元青花瓷器的造型与纹饰和中、西亚两国藏元青花瓷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我们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乃至迹象表明，这些器物是元代专门为适应伊斯兰人的生活习俗制造的，器型硕大的碗盘和罐瓶，运至伊斯兰地区之后又被什么人重新运回中国。或者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是为伊斯兰烧造的，因故停滞中国没有运走的。再者，从历史而言，我们同样没有任何证

据表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曾经出售过中国元青花瓷，更没有证据表明这批元青花瓷又被卖回中国；那么，同样道理尽管这些瓷器的造型同样硕大，我们仍然没有证据和理由说这是为伊斯兰烧造的。而且，我们只能认为它是为当时的元朝人（蒙古统治者）自己烧造的。由于价值过于高昂，大元的一般人难以涉足。就算我们不去考虑元青花瓷产生的诸多因素，也不去考虑它是蒙古统治者的灵魂与圣物，就只凭高昂的瓷价令人望尘莫及这一点，我们也只能认为它是为大元蒙古统治者制造的。这些器物品类繁多，远比伊朗和土耳其藏品丰富得多，数量也远远超过上述两国藏元青花瓷的总和。中国国内各省博物馆现藏有一百余件加上世界各国博物馆藏有二三万件，总共三四万件，已等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藏元青花瓷总和的几倍，起码这批元青花瓷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不是为伊斯兰烧造的，也没有到过伊斯兰国家，器型同样硕大，层次同样繁多，画得也那么满密，空间也甚为狭窄。看来，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元青花瓷为伊斯兰烧造的理论和他最基本事实。假如，你不同意这种论述，你又将怎样解释这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元青花瓷装饰艺术不正是中国绘画大师们的中国画无限发挥的具体体现么？不正是历代中国绘画大师们实中见虚、实而不塞、又满而不闷的手法么？空间非常狭窄，不正是体现中国绘画基本要领所提倡所表现的“一烛之光，通室皆明”的理论么？元青花瓷不正是中国绘画于大元时代具体体现的实物证据吗？它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伊斯兰的了呢？仅仅为了历史的真实和民族的尊严，八十年后的今天，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和认真思考的么？

其实，当初只因为元青花瓷在伊朗和土耳其被发现、伊朗和土耳其才被称之为世界元青花瓷艺术宝库，为伊斯兰烧造等一系列错误论述也由此应运而生，不过仅仅是一种推断，虽然没有证据，却被世人拿这个假设当做论据错误地论述了六十余年。如果我们能够不抱任何人际关系的成见，作一次纯学术探讨，我们能否心平静气地进行思考，为什么超出伊朗和土耳其藏品总和几倍的不是为伊斯兰烧造的（没有证据说它是为伊斯兰烧造的）元青花瓷的型制也那么硕大，层次也那么多，画得也那么满？我们将如何理解又将作何解释？另外，近二十余年来在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以及大江南北各地陆续发现的那些举世无双的举足轻重的大器、重器，足以构成改写和纠正元青花瓷六十年错误论述的证据。据调查得知，这类元青花瓷精品，现存全国各地收藏家手中的至少有近千件（但它们不是景德镇一地所产），枢府瓷和其他诸多民窑烧造的元青花瓷为更多，甚至十倍八倍于官窑青花瓷。在电子信息时代（现在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再不会像七十年前那样，被愚昧与无知，甚至是一己私利，或者某人的一张微薄的脸皮而不顾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而再次歪曲事实像第一对象耳瓶那样埋没它们吧？进而再一次对历史和对祖宗进行诽谤，对子孙再次欺骗。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又将作何解释？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元青花瓷中装饰有深奥佛学哲理，意境深远超脱，有禅意的器物最为珍贵难得。那些绘有松竹梅的文人画篇，伴随着佛教纹饰出现。其他一切装饰内容均与大元意识形态切切相关并为世人喜闻乐见，似乎每件元青花瓷装饰纹饰均为佛教或藏传佛教的纹饰。没有一件，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一件装饰有伊斯兰纹样和文字纹的元青花瓷。

讨论到这里，我们说元青花瓷不是为伊斯兰世界烧造的这种说法，理由是很多的，相信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发表的大量实物证据（自原始社会到宋元时期的南北各窑），说明层次多、画得满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始终不渝的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乃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其中绘蒙古人物故事画篇的元青花瓷和书有回鹘式蒙古文字和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佛教经文的器物，尤其绘成吉思汗铁木真神话故事的画篇构成元青花瓷不是为西亚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们烧造、而是为大元蒙古统治者烧造的圣物与灵魂的铁证。元青花瓷是大元文明和整体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大元多元中华民族历史悠远的见证。那么，我们今天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上万件官民窑元青花瓷，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那不过是历史真实的实证。

8 无缘享受元青花瓷的蓝色的蒙古人

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于公元1260年初，旭烈兀军队围攻阿勒颇城，数日后城陷，烧杀五日，积尸遍街市。其后许多城市不战而降。纳昔儿从大马士革逃往埃及，大马士革人推法官木哈亦丁为首席代表，赴蒙古军营请降。旭烈兀赐给木哈亦丁锦袍，命他为叙利亚大断事官，保证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3月1日怯的不花率军入大马士革。当时内城军民不肯投降，怯的不花从3月21日开始架炮攻内城，半个月后内城降，遭蒙古军屠戮焚烧。这时蒙哥去世的消息传来，旭烈兀决定返回伊朗大不里士，留蒙古军二万人交怯的不花统率，继续攻略未下地区。这时，尽管阿勒颇——大马士革的阿尤布朝苏丹国已经被征服，但那儿仍保留着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即马木路克军，以及埃及苏丹国的君主们。当时在开罗进行统治的马木路克苏丹是忽都思（1259～1260年在位），他意识到形势正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面转化。旭烈兀与蒙古主力军一旦起程回波斯，怯的不花若无沿海法兰克人的援助，靠最多只有两万人的驻军维持征服地区将是不可能的。1260年7月26日，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异密拜巴斯（贝巴尔斯）的统率下离开埃及前往巴勒斯坦（注：拜巴斯与贝巴尔斯是不同史料中的不同翻译的两种结果）。由于旭烈兀在伊拉克、叙利亚对清真寺破坏较大，对基督教又特意保护，使拜巴斯（贝巴尔斯）和忽都思能够以保护伊斯

兰的名义呼吁圣战，激励将士。1260年9月3日两军在泽林附近的艾因贾卢特相遇，怯的不花先胜后败，致使最终全军覆没。接着，他被捉到他的人砍下脑袋。拜巴斯乘胜追击，他的军队进入大马士革、阿勒颇、直到幼发拉底河边为止的叙利亚所有地区，俘获怯的不花的妻子、子女和亲族，杀死蒙古人所置官员。消息传到旭烈兀那里，他悲愤异常，想出兵复仇，但因漠北阿里不哥与漠南忽必烈战事已起，情况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实现再次出兵的愿望，只得作罢。

这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拜巴斯（贝巴尔斯）出身于蒙古族，作为奴隶被出售到埃及，他成为一个狂热的穆罕默德教信徒，后来也成了一个凶猛的军事首领。在蒙古将官失败之后，拜巴斯（贝巴尔斯）成为叙利亚以及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主人翁。于是，他梦想把东方基督教国家完全推翻。（见《史集》余大钧译，商务印刷馆，1986年版，第三卷，第81页和《史集》，德弗雷梅里译本，第393页）。（《史集》，卡特勒梅尔译本第339页）。多桑《蒙古史》III第380至381

页，以及第362、370至374页（据拉施特和区赫布拉攸斯记）。还有III，第397至404页（据拉施特和米尔空记）。并参看T．W．海格《伊斯兰百科全书》“Salghurides”条目，第109页和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erKe”条目，第726页。海格《亚美尼亚史料》II，第176页。

这到底是藏传佛教所说的“世界的轮回”或“生命的轮回”呢？还是佛经所述的因果报应？到底有多少蒙古贵族和他们的军队死于被他们作为奴隶所出售的人们手中？遗憾的是，在蒙古异姓贵族中有为数不少像怯的不花这样有资格享受民窑元青花瓷的战争中起家的奴隶，和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却永远没有福气享受这种荣誉和青花瓷。乃蛮人怯的不花和贵族出身的旭烈兀都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们都没有见到景德镇浮梁瓷局御土窑和民间三百座民窑烧造的真正意义上成熟而完美的元青花瓷。

六 谁是青白釉元青花瓷的拥有者图录列表

- 图 6 · 1 《元朝秘史》书影
- 图 6 · 2 蒙古贵族占良为奴见《滋溪文集》
- 图 6 · 3 善斌卖身契
- 图 6 · 4 延祐三年也的迷失卖女为婢执照
- 图 6 · 5 元 亦集乃路河渠司文书
- 图 6 · 6 《蒙古源流》阿拉克·苏勒德写本书影
- 图 6 · 7 《黄金史纲》喀喇沁王府写本书影
- 图 6 · 8A 元 青花蒙文铭八宝缠枝牡丹纹狮首耳大罐
高 46.5 厘米 口径 18.5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8B 元 青花蒙文铭八宝缠枝牡丹纹狮首耳大罐口部
- 图 6 · 8C 元 青花蒙文铭八宝缠枝牡丹纹狮首耳大罐底部
- 图 6 · 8D 元 青花蒙文铭八宝缠枝牡丹纹狮首耳大罐局部
- 图 6 · 9A 元 青花大汗成吉思汗铁木真接见丘处机人物纹大罐
- 图 6 · 9B 元 青花大汗成吉思汗铁木真接见丘处机人物纹大罐局部
- 图 6 · 9C 元 青花大汗成吉思汗铁木真接见丘处机人物纹大罐局部
- 图 6 · 9D 元 青花大汗成吉思汗铁木真接见丘处机人物纹大罐局部
- 图 6 · 9E 元 青花大汗成吉思汗铁木真接见丘处机人物纹大罐局部
- 图 6 · 10A 元 青花人物花鸟花卉纹祭祀台
长 46 厘米 高 35 厘米 宽 15 厘米 重 22 公斤
- 图 6 · 10B 元 青花人物花鸟花卉纹祭祀台
- 图 6 · 10C 元 青花人物花鸟花卉纹祭祀台
- 图 6 · 11A 元 青花伯颜兵临城下迫降图人物纹罐
高 26.5 厘米 口径 17.9 厘米 底径 18.5 厘米
- 图 6 · 11B 元 青花伯颜兵临城下迫降图人物纹罐口部
- 图 6 · 11C 元 青花伯颜兵临城下迫降图人物纹罐底部
- 图 6 · 11D 元 青花伯颜兵临城下迫降图人物纹罐
高 26.5 厘米 口径 17.9 厘米 底径 18.5 厘米
- 图 6 · 11E 元 青花伯颜兵临城下迫降图人物纹罐
高 26.5 厘米 口径 17.9 厘米 底径 18.5 厘米
- 图 6 · 12A 元 青花文姬归汉纹人物大罐
高 30.2 厘米 口径 20.7 厘米 底径 20.3 厘米
- 图 6 · 12B 元 青花文姬归汉纹人物大罐
高 30.2 厘米 口径 20.7 厘米 底径 20.3 厘米
- 图 6 · 12C 元 青花文姬归汉纹人物大罐
高 30.2 厘米 口径 20.7 厘米 底径 20.3 厘米
- 图 6 · 12D 元 青花文姬归汉纹人物大罐口部
- 图 6 · 12E 元 青花文姬归汉纹人物大罐底部
- 图 6 · 13A 金 文姬归汉图 张躅
卷绢本 设色 纵 29 厘米 横 129 厘米 吉林省博物馆藏
- 图 6 · 13B 金 文姬归汉图局部
- 图 6 · 13C 金 文姬归汉图局部
- 图 6 · 14A 明妃出塞图 宫素然 局部
卷纸本 水墨 纵 30.2 厘米 横 160.2 厘米
- 图 6 · 14B 明妃出塞图局部

- 图 6 • 14C 明妃出塞图局部
- 图 6 • 14D 明妃出塞图局部
- 图 6 • 15 南宋 文姬归汉图 陈居中
立轴 绢本 设色 纵 147.4 厘米 横 107.7 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图 6 • 16A 元 青花蒙古人物大罐
高 46.5 厘米
- 图 6 • 16B 元 青花蒙古人物大罐
高 46.5 厘米
- 图 6 • 16C 元 青花蒙古人物大罐口部
- 图 6 • 16D 元 青花蒙古人物大罐
高 46.5 厘米
- 图 6 • 16E 元 青花蒙古人物大罐
高 46.5 厘米
- 图 6 • 17A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一对
高 30.0 厘米 口径 22.0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7B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一对
高 30.0 厘米 口径 22.0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7C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一对
高 30.0 厘米 口径 22.0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7D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口部
- 图 6 • 17E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一对
高 30.0 厘米 口径 22.0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7F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底部
- 图 6 • 17G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一对
高 30.0 厘米 口径 22.0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7H 元 青花蒙人左弓海冬青射鹿图大罐一对
高 30.0 厘米 口径 22.0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8A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一对
高 29.9 厘米 口径 21.5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8B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口部
- 图 6 • 18C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一对
高 29.9 厘米 口径 21.5 厘米 底径 19.5 厘米
- 图 6 • 18D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底部
- 图 6 • 18E 晋 洛神赋图 顾恺之 局部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 27.1 厘米 横 572.8 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图 6 • 18F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局部
- 图 6 • 18G 晋 洛神赋图 顾恺之 局部
- 图 6 • 18H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局部
- 图 6 • 18I 晋 洛神赋图局部
- 图 6 • 18J 元 青花蒙人右弓灵异车骑鹰猎猛虎大罐局部
- 图 6 • 19A 元 青花成吉思汗射大雕纹广口瓶一对
- 图 6 • 19B 元 青花成吉思汗射大雕纹广口瓶口部
- 图 6 • 19C 元 青花成吉思汗射大雕纹广口瓶底部
- 图 6 • 20A 元 青花蒙古武士左弓射鹿图纹梅瓶一对
高 50.5 厘米 底径 14.8 厘米
- 图 6 • 20B 元 青花蒙古武士左弓射鹿图纹梅瓶一对
高 50.5 厘米 底径 14.8 厘米
- 图 6 • 20C 元 青花蒙古武士左弓射鹿图纹梅瓶口部
- 图 6 • 20D 元 青花蒙古武士左弓射鹿图纹梅瓶一对
高 50.5 厘米 底径 14.8 厘米